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书海泛舟

以大历史观看待中国的现代化

□ 白少飞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内部衰败，还有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国不但已无法按照之前的逻辑走王朝循环更替的道路，而且是不得已被裹挟到了世界文明进程当中：现代化成为了一个无可逃避的征途。然而，就当时的境况看，基础怎样，方向何在，何为动力，节奏、力度又怎么把控，均需要从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探寻。

现代化理论中的几个评价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以宏观史学视野，从大历史的脉络勾勒和评析了近世中国的社会巨变。我们结合理论评析中英和中日的现代化进程。

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启动社会变迁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一区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中英两国交往礼单中已露端倪。当时中英社会的差别是巨大的，且这一不同内含了现代化的本质。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固模式，政治上是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帝国，丝毫不见启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内部动力和物质条件。不同于中国的单一结构式的农业社会，英国已经孕育出内源性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变革的前提条件，如早期城市化、早期商业化、早期工业化、世俗化等，这种多元型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具有的适应变迁的弹性、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内在活力，率先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为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充分的条件。

从现代化理论这一角度来观察和诠释中英两国的那段历史，也就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那种认为西方更多是靠对东方掠夺而发达起来的想法并不准确，当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它们在启动阶段是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向前发展的社会不会只有富强欲望，不会把增长能力和效度当作唯一标准，更应是向内寻求文明基因的社会。

被延误的现代化

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对比同时期的日本，它取得成功就在于它没有经历过衰败的过程，只受到轻微边缘化，就直接进入了现代化过程。这些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比较中，而直接检验两场运动成果的便是甲午海战及战争之前的战备情况和社会情态。当时不仅两国中央政府与官僚政治、社会氛围存在巨大差异，还有更深层次的差异。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很有限，经济结构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能力很有限，教育文化体制对摄取外来科学技术采取抵触态度，官僚特权阶层对社会变革更是抵制。日本则凭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具有现代政治特征的君主立宪制，上下结合的有选择性的“殖产兴业”路线，以及较高的危机意识、整个民族对外来先进事务的学习意识和容纳能力等，抓紧启动并大力推动了适应性的现代化。

用现代化理论来看中日两国的那段历史，也就发现了窗口期、自主性与历史基础的关系。应该说，历史给予各民族窗口期是一视同仁的，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则要看当政者的智慧、格局和胆识、勇气，还包括整个社会的氛围和所形成的共识。

发展型国家的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概括东亚的成功经验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的巧妙结合”，即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等，这些措施有利于高度的社会动员，以推进高速工业化，而又照顾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追求高增长的模式也代价不菲，如政治权利与生活水平提高受限制，血汗的泰勒制，生态的破坏，环境严重污染等，过高速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最后也将破坏经济增长。欲速则不达，还得从头再来。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更为迅速，然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怎样管控直至消除这种“发展型”现代化的副作用，已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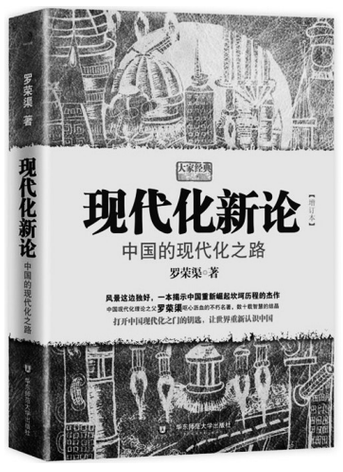
国家有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这也正是现代经济成长所必需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滥用政治权力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过分的集权与干预也导致官僚政治的巨大膨胀，给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可能造成经济生活的政治化。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独立影响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被解放的程度而逐渐增大。

中国现代化征途的几个提示

现代化征途必须转变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态。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必当是全面的、彻底的现代化。

现代化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历史业已说明，凡是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或一定成果的现代化，一定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现代化；而要使所有人都参与其中，那这个国家或地区必须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也即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而非少数人特权的政治。

现代化是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还必须把握好现代化的步骤、节奏和重点，这是战略需要，更是战术安排。如果到了一定阶段而没有适时转型的话，就可能错失不多的际遇。这意味着即使侥幸没有导致现代化的失败，也必然是折腾的现代化。我们要全面把握、快慢结合，立足于慢，着眼于快，战略考量而不是轻视忽略慢变因素，统筹兼顾而不是忽略快变因素。



书名：《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
作者：罗荣渠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金融危机的隐蔽性

□ 赵 奇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部分，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作了深入的描述。

首先，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资本过剩状况。同时，由于商品生产中出现的信用制度日渐成熟，也产生了诸如公用事业、矿山、铁路等的所有权证书。这些证书，实质上就是现实资本的证书，其表现形式就是证券。虽然这些证券“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但是“这个想象的财富，就其原来具有一定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也就是说，证券的价值会随着生产的扩大而提高。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这种证券不仅成为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部分，而且成为银行家资本的很大构成部分。马克思这段论述，站在今天的情形来看，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股市上，股民“炒股”的心态，确实带有普遍的赌博成分。许多人进入股市，不是为了长期投资，而是带有“捞一把就走路”的投机心理。而且，现在不单个人“炒股”如此，一些私募基金甚至一些银行资金，也在或明或暗地进行赌博式的“炒股”。另外，在一些银行，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也在不断地涌现，其实质也是所有权证书的有价转让。

马克思还对金融危机的隐蔽性作了深入的分析。为什么许多金融危机看起来都是突然之间爆发的呢？马克思分析出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日益扩大，对资本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因为现实资本不足以支撑这种需求，就产生了种种信用制度，从而使资本可以得到预支。由于信用制度惊人地扩大，银行家就可能把受委托的大量信用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加以利用，“攫取现实积累的很大部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总是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了。第二，只要社会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资本回流能够得到保障，银行家的这种信用就会不断地持续下去并扩大起来。第三，即使出现市面商品过剩、产业过剩的情况，由于银行家的投资是分散的，资本的传导有一个过程，个别行业的过剩状况要反映到对资本的危害上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分散的资本的危险没有集中起来之前，银行家总体上是不会感受到危机的。马克思描述道：“在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等到各方面的危险汇集成小溪，再由小溪汇集成小河，再由小河汇成大河，最后，在河的下游，银行家建成的堤坝才感受到汹涌河水的拍打。而这种力量的冲击往往一下子就很猛烈，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冲垮银行家的堤坝，形成金融危机。因此，考察金融危机首先要考察产业危机；考察产业危机首先要考察企业危机；考察企业危机首先要考察小企业危机。从这个层面上讲，扶持小企业就是扶持金融业。如果瞧不起小企业，忽视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最终就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危及金融业自身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蝴蝶效应”。因此，对金融业来讲，勿因小而不为，可谓至理名言。

学思录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 沈小勇

四维说，出自《管子》。《管子·牧民》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意思是说，国家确立有四个根本的支柱，这就是礼义廉耻。礼，能使人注重礼节与规则；义，能够使人充满仁义而无巧诈；廉，能够使人清廉不藏恶行；耻，能够使人感到耻感而不妄为。这四根柱子如有一根断裂，政权就要倾斜，因而缺一不可，如果国家丧失这四维，国将不国。

孔子发展了管仲的礼义治国的基本思想，以仁释礼，提倡为政以德。后世儒家学说普遍重视仁政治国，注重廉耻以确立人的自身价值。可以说，礼义廉耻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准则，也是儒家社会学说的核心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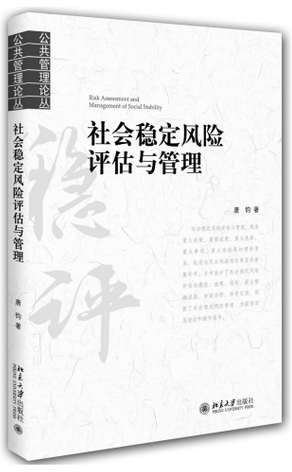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专门有一篇讲廉耻的文章这样写道：“《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说，礼义廉耻至为重要，礼义关乎治人，而廉耻则关乎立人。但顾炎武认为，这四者之中，耻最为重要。顾炎武为何如此认为？他以《孟子》之言证明，“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在顾炎武看来，人如果无耻，就会发生不廉洁的行为，更会“悖礼犯义”，也就是说，做不到“耻”，会成为一切恶行的根源，所以他特别强调“行己有耻”。

礼义廉耻四者，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社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必然有其普遍价值的特征所在。孙中山在创立中华民国时，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在设计时前身有四个口袋，其所寓意义即是表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可见礼义廉耻作为传统社会价值观依然有其不可比拟的现实作用。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礼义廉耻不可偏废。只有知道了礼是什么，人们才能按照规范行事而不逾节；只有知道了义字当头，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仁义，有仗义，有勇为，有担当；只有知道了清廉，才能洁身自好；只有知道了耻辱和羞耻，才能使百姓有所敬畏，言行有底线。对于一个政权而言，自然要格外重视礼义廉耻的道德建设，让人们明是非，知荣辱，有敬畏，有准则，特别是有耻感之心，才能使社会充满温情。



重点推荐



书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
作者：唐钧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编者按：中办、国办于2015年4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切实做到应评尽评，着力完善决策前风险评估、实施中风险管控和实施后效果评价、反馈纠偏、决策过错责任追究等操作性程序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一书结合风险管理的国际标准和我国的实践经验，设计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模型、流程、指标，提出精确识别、全面分析、科学定级。本书创新了以风险内部控制和风险外部合作为主的社会稳定风险管理，并提供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的顶层设计和操作范本。

张成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认真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把可能影响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决策之前。

稳评工作的开展和实施，要以科学的定义为前提。为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在理论研究和项目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的四个典型阶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稳评的四阶段定义。

粗放阶段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仅评估项目或政策等待评事项，是否具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的风险。

规范阶段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在政策、项目、活动的制定或实施之前，通过全面科学地分析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预测其损害程度，预估责任主体的承受能力，进而综合评定风险等级。

精细阶段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系统应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方法，全面评估待评事项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客观预估责任主体和管理部门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合作能力，科学预测相关利益群体的容忍度和社会负面影响，提前预设风险防范和矛盾化解的措施，进而确定该待评事项的当前风险等级，并形成循环。

人性阶段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同时兼顾两个维度：一是民众抵触和抗议的最小化，也即底线思维的反对最小化；二是民众满意度的最大化，也即人性化导向的满意度最大化。

本书从根本上回应了社会在此方面的迫切需求，在界定稳评的同时，实际上提供了稳评工作跨越式提升的方向和宗旨。

汪大海（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稳评是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事项、重大活动等的硬性要求，也是与民众利益相关事宜的前置环节。从风险管理的系统视角，尚缺乏系统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管理方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一书，设计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模型、流程、指标，提出稳评应精确识别、全面分析、科学定级。

该书总结了科学的稳评应包含的五大要素：一是意愿度，指实施项目的意愿及其强度，包括官方意愿度和社会意愿度；二是支持度，指对于项目的实际支撑、具体行动、实施保障等多方面配套状况的真实程度；三是容忍度，主要针对不能容忍的风险进行排查并评估其状况，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禁忌、民众普遍的耐受力状况、地区习俗和村规乡约的禁忌等风险；四是反对度，主要指利益全体的真实反对程度，包括由于损害或损失等导致的直接反对，和由于连锁反应、替代方案等导致的间接反对；五是风险度，指待评事项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综合状况，再加上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状况。在稳评的实操中，应综合考虑以上五大评估要素，全面分析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预测其损害程度，预估责任主体承受能力，进而综合评定风险等级。

该书还直面稳评的问题，主动提出了稳评在风险定级时存在的四项风险：一是愿力干预定级的风险，尤其是地方领导的意愿干预定级的风险；二是确定风险可控性的风险，存有主观判断的风险；三是特定风险项的加权风险，也即在设置优先项时存有风险；四是稳评报告的发布风险，风险等级等公布时易遭致质疑。对此，该书一方面采取问题导向，针对可能的失误提供了稳评的规范方法；另一方面则是目标导向，针对降低反对度和提高社会效益，提供提升稳评的信度和效度的制度安排和措施建议。这些既是规范稳评方法的要件，同时也都是提升稳评效益的“抓手”。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中央多次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实践过程中，目前各地的创新措施仍未能从稳评机制的顶层设计，提出高屋建瓴的机制创新方案。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一书创新性地提出了稳评机制的六环节：准备与规划（英文缩写为RPP，下同），风险识别（RI），风险分析（RA），风险定级（RE），内部风险控制（RC），外部风险合作（RSC）。这对稳评机制的建立健全直接提供了重要参考。

该书提出：社会稳定风险的内部控制是指为提升社会稳定风险的承受力，责任方和相关管理方，在内部树立坚持民本的观念、实施责任落实、实现工作规范、开展综合治理，从而切实提升以防范力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成效。风险内控应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民本：阻止风险升级，降反对度。二是责任落实：源头治理，连带联动，增责任力。三是工作规范：标准化处置，增强防范力。四是综合治理：防范风险和减轻损害，增强应急力。

该书提出：社会稳定风险的外部合作，是指为提升社会稳定风险的承受力，责任方和相关管理方，对外积极开展公共关系、动员群防群治、落实矛盾化解、主动舆论引导，从而切实提升以公信力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成效。风险外部合作也应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公共关系：加强风险沟通，减阻力增助力。二是群防群治：责任共担，风险自治。三是矛盾化解：构建社会秩序，降低民众损失。四是舆论引导：保持公信力，弘扬正能量。

综上，稳评机制的建立健全，必须“评管结合”。这既是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的配套措施，也是发挥稳评应有功能的基础保障。